

批林批孔運動之收放轉化

吳德里

一 前言

在毛澤東親自發動及領導下，共匪批林與批孔兩項政治運動合併起來進行，已將近半年。這個運動現在正步入快速演變，目前可以看得出來的是，運動主要打擊對象為一切反毛的組織與個人，特別是省級及共軍師級以上領導機構中，所謂林彪、陳伯達餘黨。文革派企圖通過清洗他們來掌握軍政大權，所以此運動表現在外的，雖然是政治思想教育運動，其落實，卻表現在政權轉移之上。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，在理論上企圖通過共產主義與儒家思想的對立，來打擊以儒為本的民族精神，從而鼓動一個向毛澤東思想認同的運動。在現實政策上，為鞏固已有權力，以拉攏羣衆運動中具有領導力量的幹部、知青，對於某些措施，它以正規化與制度化來「收縮」。而這個運動的悲哀，正如共匪紅旗雜誌所言，乃是若「沒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，不發動億萬人民羣衆形成巨大力量，就不可能完全摧毀孔孟之道①」，在「放」的情勢上來講，在匪黨內部到目前為止，最狂熱且是歷時最久，規模最大，影響最深的政治運動，惟文化大革命稱得上。共匪自稱，在文革中得到許多寶貴的經驗，這些經驗足以保證使狂熱再度出現，而合乎毛匪的利益嗎？如果我們相對亦牢記著毛的敵人在過去八年，同樣亦獲得不少寶貴的教訓，現在我們就可以從運動的收放轉化，來探討其間得失。

二 收放兩難形勢的形成

共匪的「批林批孔」運動，從它背景來看，可以說是「林彪事件」的延續，「五、七一工程紀要」的發展、「批修整風」、「批孔揚秦」、「批林整風」的提高，與「戲劇改革」的擴張。這些背景形成此運動與文化大革命

相異的地方，乃是其開始在毛澤東有預謀，有詳細計劃，並力圖作有效控制的情況下推動。此運動之所以始則迂遲延緩，繼則有急轉之勢，究其原委，首先不得不檢討的，乃是以工農兵為運動主力的問題；至於毛澤東何以依靠工農兵力量為主力軍，則不能不檢討過去文革的經驗。

衆所週知，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的關係至為密切，如果沒有紅衛兵，文化大革命完全不可能如此激烈，如此普遍。然而如果沒有劉少奇冒然派遣一萬多名工作組，到北平各機構學校，挑動學生鬥學生，造成一片白色恐怖，紅衛兵運動不會在如此短時間，迅速蔓延整個大陸。然而，雖說紅衛兵是工作組高壓之下爆發出來的，如果沒有一九六一年以來，在劉、鄧領導下的匪中宣部，縱容以談歷史、傳知識、講故事、說笑話、寫雜文與歷史劇，「全國一盤棋」的揭發黑暗面，反對毛澤東政策；「造反有理」思想會不會如此狂熱，當「無產階級接班人」的野心會不會如此一發不可收拾，當是疑問。劉少奇煽動了不滿現狀的風氣，卻沒有善於引導它歸入反毛反共的軌道，在羣衆運動自動自發地出來以後，錯誤的以當權派的身份壓制它，打成對立面。反而是毛匪澤東，在巧妙的轉化下，將青少年的憤怒，在罷官運動，罷劉、鄧當權派中，發洩掉了。

但是根本上與毛澤東思想不能相容的，正是紅衛兵。紅衛兵發展派性，形成無政府主義、風頭主義、行會主義及多中心論。因此，一九六七年，當文革在地方進入奪權鬥爭以後，毛匪即聲稱，「知識份子、青年學生中泛濫出來的小資產階級、資產階級思想」，已經破壞了無產階級革命大聯合的形勢。

他輕蔑地評斷：「運動的發展證明了主力還是工農，兵只是穿軍衣的工農……革命的知識份子及青年學生不得不退居到從屬的地位②」。從此以後，共匪即強調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③。在這

點上，如其說是它領導階層主觀認為工會是較易收放的力量，不如說是在毛澤東摧毀知識份子的政治集團以後，紅衛兵一切行動不聽指揮證明他無資格成爲毛的接班人。

正是因爲以上的經驗，共匪人民日報今年二月二日，在一篇充分代表領導階層意見的社論「把批林批孔的鬥爭進行到底」裏，明白指出，「廣大工農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軍」，社論認為，「由於工農兵最敢同舊傳統觀念決裂，批林批孔最內行，工農兵起來了，批林批孔才能批深批透」。

認爲工農兵必可達成批林批孔交代的任務，那是共匪領導者的主觀意願。不能不指出的是，當前所謂工農兵正是毛在文革中所強調的工農民兵；匪正規解放軍，在毛一分爲二的策略下，已經成爲假想的工農民兵力量的對立面。

共匪農村在一九六六年，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造反以後，農村曾經颯起一陣「經濟主義」的風，農民不僅瓜分「人民公社」中的糧食和資金，並且藉「北上告狀」及「革命串連」的機會，紛紛進入城市，影響農業生產甚鉅。一九六八年以後，農民首先反對紅衛兵將暴行帶到農村，當人民日報推行壓縮紅衛兵的政策，呼籲紅衛兵熱烈歡迎由工農兵組成的「毛澤東思想宣傳隊」駐校時^④，紅衛兵以此舉無異鼓勵農民進城，堅持抵制。

一九七〇年以後，匪承文革之弊害，不得不在農村重撥自留地給農民，允許他們經營家庭副業，開放農村集市，恢復「評工記分」及「勞動定額管理」，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，確定「購」「留」比例，以及加價獎售超額交售產品等現階段農村經濟政策。這些措施，當前又被視爲資本主義黑回潮來揭發。例如在廣東英德，生產隊實行副業包產到人，社員外出搞副業。農民認爲副業包產能增加集體收入，而社員個人外出搞副業是依靠勞動賺錢，不算資本主義。農民也認爲，批判孔子和林彪，解決不了眼前農村問題。收成雖好而收入亦不見增加，使農民產生「精仔搵錢、傻仔耕田」，「隊有千金，不如自家日進一文」的看法，對資本主義傾向鬥爭，很不賣力。最推崇的是「寧與千人好，不與一人仇」的老好人思想；其有甚者，不僅爲個人打算，還爲鄉里謀個人利益，不顧集體經濟計劃，自發耕種高價作物^⑤。

共匪企圖在農村進行鬥爭，開展辯論討論，農民態度消極。共匪企圖利用上山下鄉的知青，挑動農民鬥農民，反應很壞，認爲他們「地皮都沒站熱

，就管得那麼寬」^⑥。農民最不滿意的，是共幹利用職權，貪污舞弊，迫害鄉里的事。中國農民的私有制觀念與保守固執的看法，對批林批孔運動是阻力大於助力。類似六月廿日路透社電訊所透露的，農民揭發共幹腐化的大字報愈來愈多，中共這個官僚特權的面目就愈益無從掩飾。

其次要探討的，是工人階級在運動收放轉化中，舉足輕重的地位。

衆所週知，毛派在文化大革命之初，就宣稱青年學生是文革的先鋒隊，而工農羣衆是文革的主力軍。但是直到文革結束，紅衛兵雖然完成先鋒隊的任務，工農羣衆根本上稱爲毛派的主力軍是不恰當的，毛澤東是依靠林彪槍桿子，來收拾政權。

一九六八年以後，是毛派發動工人力量的時期，工人耽擱生產，捲入「百萬雄師」的武鬥。八月下旬，工宣隊進駐學校，是在共軍配合下進行的。由於工宣隊握有絕對性的權力，他們進駐學校以後，迅速散佈到每一角落，發揮監視行動，使學生很難得到共同商抗的機會，陷入個別孤立，很快就使學校的「獨立王國」與「山頭陣地」，失去發號施令的作用，瓦解了紅衛兵的力量。

文革派今欲故技重施，但是失掉如臂使指的槍桿子力量爲後盾，是以基於文革時期的教訓，它首先在二月初旬頒佈一項「中央八條指示」，作爲約束命令，其中第一條規定：

「嚴禁派系組織，人身攻擊，和對批判者濫用私刑。」

第二條：「嚴禁武鬥、串聯，和組成類似紅衛兵組織的活動。」

第三條：「在工廠展開運動，基本上不影響生產，禁止停工舉行『批林批孔』大會。」

故以工人爲主的大規模運動，顯然是在力圖避免影響生產前提下，受到限制。

但是爲了經濟上的需要及確保品質提高，一九七〇年以來，共匪一直在強調維持規章制度的重要，實施「勞動考動」、「質量檢查」、「崗位責任」、「經濟核算」等企管制度。這些制度在工廠形成以下問題：

一是所謂領導不相信羣衆，用規章制度來「管、卡、壓工人」的問題。

二是幹部不依靠「政治掛帥」來調動工人積極性，而單純依靠「獎金掛帥」、「物資刺激」的問題。

三是領導不接受羣衆意見，壓制新生事物，對工人抱懷疑態度，反對工人參加設計工作，迷信專家、洋奴哲學的問題。

四是不貫徹「精簡下放」，而借「調整充實」，恢復原有機構，造成人浮於事幹部脫離羣衆問題。

五是幹部不參加勞動生產的問題。

可以說工人與匪偽政權這個資主，存在剝削與被剝削的矛盾，此矛盾，落實在執行政策的匪幹與工人之間，以個人恩怨與派系糾紛的鬥爭，表現出來，隨時可由怨讎而釀成事端。

但是工廠內部的矛盾，似非共匪所欲擴大的事端，除非，此矛盾有助於清除文革派的主要目標。四月以來，共匪一再強調文革重要經驗，就是毛澤東對工人大聯合的指示。當時的指示強調，「在工人階級內部，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，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爲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⑦」。不斷地聲稱不應糾纏於各種人民內部矛盾，應該掌握大方向，不斷深入發展；這是不是因爲打擊林彪餘黨，正是所謂的大方向。而工會這個文革派的新建力量，如果牽扯到所謂革命隊伍內部來纏不清的恩怨鬥爭事件裏，就會直接削弱了文革派的勝算呢？

現在看來共匪新組的工會，不但在改裝成城市民兵力量上，具有絕對的重要性，並且也接過了文革以來，掌握在知識份子、掌握在共軍總政治部手中的理論與文教宣傳的任務。共匪的工會現在是十足的「多面手」，舉凡消滅階級、消滅城鄉差別、體力和腦力的差別的任務，都要他們負責。工業生產的成績，照例是要他們趕上去，五月以來他們是推廣樣版普及的文藝主力，六月在紅旗號召「加強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」下，工人又是基本骨幹。據說是因爲「工人的高貴品質」，工宣隊重新又整頓一新，開進學校。最後，他們飾演在地方揭發林、陳餘黨，進京貼大字報告皇狀的主要角色。

工會對工人的收放轉化運用順利嗎？工運是否已成爲運動的主力，祇少在目前，我們還沒有看出何足以令文革派樂觀的跡象。

從江西省流露出來不完全的報導顯示，根據江西僞人民電台六月三日的報導，江西省造船廠是一個積極培養工人理論隊伍的模範。在共匪黨委的提倡下，工人幹部們寫了大批批判文章。廣播得意地數陳成績「這其中有十多篇已經被江西人民廣播電台、南昌日報、南昌市僞人民廣播站，以及江西日

報採用」。

接着，就是在這段時期，匪廠的黨委負責人發現，「有些青年理論骨幹不太注意聯繫實際，關起門來想搞點名堂」。脫離實際是可疵垢的，青年們被教育去認識，「只有到火熱的鬥爭實際中去學，才能真正掌握革命理論，爲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服務」。廣播以江西省造船廠的工人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成爲先鋒闖將而結束；至於他們闖出的成績是什麼，江西省匪廣播電台不會說明。

時隔不久，我們從北平廿三日法新社電訊得悉，六月十九日在南昌發生嚴重流血事件，一部份工人在南昌街道上組織武裝巡邏隊，掀起動用石棒和鐵枝，傷亡達二百餘人的武鬥，我們不知這些隊伍與匪民兵組織的關係。此外，與上述江西造船廠吹噓的超額生產報導相反，江西的工人在大字報揭露，由於「派系之間的內部鬥爭，我們工廠一直只能生產分配限額的百分之三點六」。來自江西屬於數個不同組織的工人，在很短時間內連續在北平貼出控訴的大字報，我們沒有資料證明其間有無工人串聯的組織。一些大字報署名的作者攻擊爲江西省前革委會主任，黨委第一書記，軍區第一政委程世清，證據前鈞，卻顯然已觸犯「中央八條」，不准武鬥，不准指名攻擊，嚴禁派系組織等戒律。

江西造船廠工人理論隊伍專研書本的偏差，在共匪視之固然是脫離「批林」大方向。工人理論隊伍，一接觸到現實，儘管發言時旁證博引，對社會以及內部鬥爭卻說不清、道不明，卻是共匪報刊檢討經驗時屢見不鮮的現象⑧。這樣的一支隊伍，如果都像四月十七日吉林廣播所披露，已組織有非法串聯、戰鬥隊一類的派系團體，當它自動自發的行動起來以後，有沒有一股力量保證可收放自如，那應當是毛澤東的問題。

甚且，除此之外，工會更負擔了整頓、加強工宣隊進駐學校的任務，企圖通過設立專門組織，制定管理、輪換制度，以及加派工宣隊員，來進行工宣隊在教育領域內攙沙子的作用。當前工宣隊派抵學校，首先接觸的就是要在共匪各級黨委一元化領導下，抓好批林批孔的這件大事。在這裏，文革時期軍宣隊「軍管」的創痛重新被勾起。如果我們記得文革「軍管」與「工宣」實無兩異；則僞清華大學、北京大學的學生們聲稱，在「批林」過程中，「學校中有一些人，即轉移方向，否認林彪路線的極右性質，煽動所謂批極

「左」，反對批林，而把矛頭指向文化大革命」^⑨，此實意義深長。同樣的，湖北武漢地區學校，在文革中亦是抵制軍管工宣的園地。華中工學院的師生，批判林彪罪行時，亦特別控訴他「製造分裂，挑動羣衆鬥羣衆」的罪惡；師生們一致強調的，是「如何加強革命團結」的問題^⑩。

現在工宣隊奉到指示，首先既是設法將林彪在文革時期，奉命「打擊一大片、鎮壓羣衆」的行動，說成是極右實質。其次，又要藉批林批孔，衝擊學校，要「依靠學校中廣大革命的學生、教職員工」，依靠他們中間所謂「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份子」，以及「工會、學生會和共青團的作用」，組成「批林批孔的主力軍」^⑪。在學校師生要團結，工宣隊員要鬥爭的衝突上，更有長期以來，贊成或反對毛澤東對於教育制度、教學內容、教學方法，與師生關係作法上的激爭；校園是否遭遇到，一如文革時期「工作組」製造恐怖以後，無法遏止的暴亂，可能是造成批林批孔運動一發更難收拾的重要因素。

來自北平的電訊報導，證實此次運動大多數大字報，確實遵守共匪在此運動中所指示的，大字報必須簽名蓋章的規定。署名揭發單位或地方林彪餘黨最大的不便，就是因此而遭到幹部或派系無情地鎮壓，許多人到北平申訴以後，回到原居地受到虐待、拘禁。雖說被揭發者不一定是文革派或林系，與此相應的報導亦顯示，蘭州軍區韓匪先楚、濟南軍區曾匪思玉、瀋陽軍區李匪德生、山西軍區謝匪振華、曹匪中南、吉林軍區王匪淮湘、湖南偽黨委第一書記華匪國鋒、北京市偽黨委第一書記吳匪德等，在受到大字報批判以後，一些人仍然出現在公開場合，顯示在大字報下面鬥爭的更複雜與激烈。根據敵後情報顯示，共匪中央政治局委姚匪文元，二月中旬，曾經在偽第二機械工業部禮堂對北平市各廠、礦、企業革委會負責匪幹及工會代表，作政策問題的報告。姚匪文元強調當前共匪的政策是寬中帶嚴，以教育為主；對於劃清與林、陳匪所謂反黨集團，以下七點為界限：

① 是因職務關係接近還是死心塌地跟隨林、陳二匪。

② 是一時受蒙蔽還是有意助紂為虐。

③ 是死黨還是被脅從。

④ 是魁首還是骨幹。

⑤ 是死不悔改還是知錯坦白且積極檢舉揭發。

⑥ 是歷史性問題還是現實問題。

⑦ 是思想問題還是一貫性問題。

其目的是為了解決省級及匪軍師級以上領導機構，不啻是提供罪名，鼓動工人向匪軍正面鬥爭；若然，那將不只是石樺與鐵條的流血事件。

三 轉化與迴避

暴亂與仇恨，正在大陸滋長，現在叫停似嫌太遲。根據文革的經驗，我們應予關注的，就是儘管歷經全面鉅大的動亂，整個領導結構瀕近崩潰，共匪仍然安渡危機。這項事實所產生的反效果，乃是西方領導人物，過份看重共匪領導階層政權轉移，相對漠視它內部動亂不滿的嚴重性；更確切地說，是對毛澤東轉化危機的手段能力，疑信相參。無可否認，文革以後承認共匪的潮流，多少要受這種心理的左右。

「批林批孔」運動，在這一層意義上，乃是共匪是否有效控制中國大陸的最現實的揭發，任何以為共匪對現行政策作適度修改，即可能緩和內部鬥爭的幻想，都是不切實際的想法。對共產黨徒來說，「矛盾鬥爭只有對抗與非對抗之分，沒有調和與不可調和之別」^⑫，在所謂「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、文藝革命、教育革命、衛生革命、五七幹校、知青下鄉」等文革新生事物問題之上，雖然基於環境，表面上有若干修正，事實上，在所謂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、文藝革命、教育革命上，它是一步也不退讓。而在衛生革命（事實上與知青下鄉渾為一體）、知青下鄉、五七幹校等政策上，十大以來，完全是退一步進三步變本加厲的作法。

在意識形態上，文革時劉匪少奇掌握全部大眾傳播媒介，由於他無有勇氣與毛匪澤東思想一刀兩斷，反而成為毛倒行逆施的代罪者。林匪彪是活學活用毛思想的第一把交椅，「五、七一工程紀要」在他死後公開他尖銳反對的一面。正如紅旗所承認，反毛反共的力量存在，「迴避是迴避不了的，掩蓋是掩蓋不住的」，不把矛盾揭出來，它遲早總要激化；揭示出來，其激化又那裏有轉化和調和的餘地呢？

阿根廷也簽署了一項和平使用原子能的合作協議，印度由一個核子能受援國而搖身一變為第三世界的核子領導者，如小的核子國間的核子競賽無法遏阻，則未來核子危機勢必日漸加深。

據美國方面的報導，今天有能力製造核子裝置的國家有二十二個，有五十個國家擁有原子反應爐，大部份從事科學研究與發電，而能够使用核子反應爐的國家大都能製造核子裝置，印度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，其原料來自核子反應爐的副產品，大約化了五年的時間，終於爆發了第一枚地下核子裝置，據美國核子專家估計，印度約花費了二億四千萬美元，可是據印度原子能委員會主席薛思納於五月卅一日表示，印度這次核試僅花費四十萬美元，

本所出版匪情叢書

- 一、共匪文教科問題論集 四十元
- 二、共匪經濟問題論集 四十元
- 三、大陸知識份子問題論集 四十元
- 四、匪黨問題論集 四十元
- 五、從馬克思、列寧到毛澤東 二十五元
- 毛澤東思想探源
- 六、中共外交與對外關係 四十元
- 七、中共的文藝整風 六十元

並聲稱印度提供了最廉價的核子試爆，如事實與印度所稱出入不大，那麼印度之例，將更會引起他國之效尤了，而核子擴散問題將無止境。

印度核試之後，曾引起各大國的關注和有關國家的指責和抗議，可是事隔一月，毛共、法、英、蘇相繼試爆後，已大大地沖淡了各國對印度的注意力，回教國家外長會議政治委員會於六月廿六日，通過對印度核試不加譴責的決議案，巴基斯坦顯然也被其他回教國家說服。原來主張停止對印度經濟援助的日、加等國，在六月廿日世界銀行主持的十三國援印財團會上，竟未阻止十四億美元的援印案的通過。總之，在最近的國際情勢演變下，印度得利用大小國家間的矛盾，大力地發展其核子能力，第二次的核子裝置試爆恐為時不會太久。

——上接第28頁——

- ①嚴章，「領導要站在運動的前頭」，紅旗，第五期，頁二七。
- ②毛澤東，關於戰略佈署（一九六七年上海）。
- ③「堅定地走向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」，北平，人民日報，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。
- ④同前註。
- ⑤廣東英德望河大隊黨支部，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」，紅旗，北平，一九七四年，四期，頁卅五。
- ⑥廣西恭城縣控汙大隊小黃埠生產插隊知青小組，「走上山下鄉的革命路」，註同前書。
- ⑦紅旗，一九七四年，第四期，頁首。
- ⑧聯系實際學習革命理論，北平，光明日報，一九七四年六月二日。
- ⑨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、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，「批林批孔運動推動教育革命深入發展」，紅旗，一九七四年，第五期，頁六五。
- ⑩湖北人民廣播電台，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。
- ⑪河南人民廣播電台，一九七四年五月廿二日。
- ⑫洪原，「學會用對立統一規律觀察問題」，紅旗，一九七四年，第四期，頁七三。